

增訂中國史學史資料編年

元明卷

楊翼驤 編著
喬治忠 朱洪斌 訂補



創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元明卷

杨翼骧 编著

乔治忠 朱洪斌 订补



创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元明卷 / 杨翼骧编著

.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ISBN 978-7-100-10158-5

I. ①增… II. ①杨… III. ①史学史—中国—元代②
史学史—中国—明代 IV. ①K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73784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

元明卷

杨翼骧 编著

乔治忠 朱洪斌 订补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三 河 市 尚 艺 印 装 有 限 公 司 印 刷

ISBN 978-7-100-10158-5

2013年10月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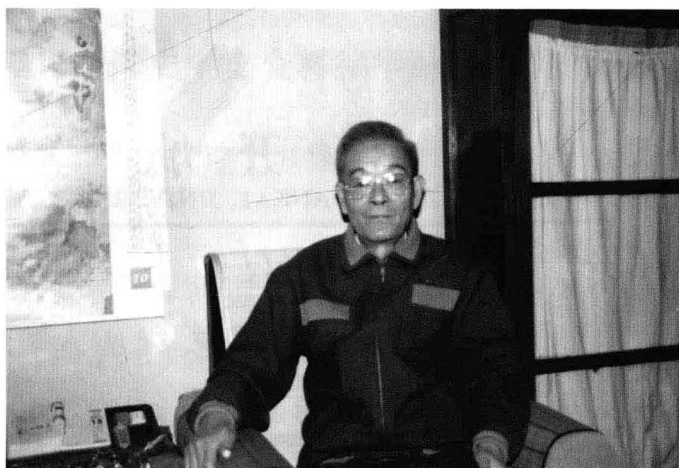
开本 710×1000 1/16

2013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32 1/2 插页4

定价: 128.00元

南开大学史学史学科创立者杨翼骧先生



杨翼骧（左）与乔治忠



乔治忠（右）与朱洪斌



南开大学

NANKAI UNIVERSITY

修良先生：您好！

来信收到，感谢您对我八十岁生日的关注。

我的八十岁（虚岁）生日微不足道，不值一庆，无奈我的一些研究生坚持操办，我屡次劝阻，他们不听，只好如此。但嘱咐他们不要张扬，通知范围尽量缩小，所以纪念文集的作者，除过时的研究生外，只有少数历史系、历史所、古籍所的旧友，另外还有一位在台湾的小同乡杜维运。夏来与于十兄^{（前）}在美国，近些年未通信，不知其地址，遂将^{（集）}原来的硕士论文删节刊登，希望她见到或闻知能与我们联系。

乔治忠是我的第一个博士生，因学有所成，已升为教授，并于去年被评选为博士生导师。我^{（包）}退休，不再招新的博士生，以后他就是我的接班人了。他是您的后辈，应以学生视之，如果他有事向您求教，请不要指教。

今年夏天天津酷热，为四十多年所未有，幸好我已于去年将一间房子装上空调，始有避暑之处。近几天又突然转冷，气温下降十余度，夜间已盖棉被，诚如您来信中所说的“气候古怪”了。

我现在用钢笔写字，手发颤，改用圆珠笔，请原谅。致礼

著祺

杨翼骧 97.9.12

杨翼骧先生给仓修良先生的信

纂修《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感言

(代序)

乔治忠

著名史学史专家、南开大学教授、业师杨翼骧先生，一生矢志于研讨中国史学史，在中国史学史学科建设中，以及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先生的贡献是多方面的。2003年春，在先生辞世后的月祭，曾写有悼念文字，及今已倏忽十载，谨摘略如下，以志怀想：

先生辞世已盈月矣，然音容笑貌，仍时时浮现于吾侪寤寐之间。念先生一生，沉潜勤勉，孜孜然治史、教学，学至深、识甚广，以学识益世者多矣，纸笔焉能尽述！乃略举一二，仅为管窥蠡测。

先生撰著，卓然立于学术之林者，约略有四：

其一曰《秦汉史纲要》，是书刊行于1956年，随即风行在莘莘学子之手，宣讲于大学课堂之上。33年后，仍被评为“筚路蓝缕之功，则非后来的著述可比”。

其二曰《中国历史大辞典·史学史卷》，先生主编其古代部分，1983年出版，为最先面世之卷，为《中国历史大辞典》全书编纂冲锋陷阵，提供经验。国内国外，一片赞扬，称之“开创性的可喜成果”。

其三曰《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乃多卷本著述，已出三册。是书集学术性、资料性、工具性于一身，以扎实功力体现高超学识，为研治史学史之学人铺路架桥，提供资料与启迪，意蕴有如洪波浩荡之长江、大河，吾辈被泽受益，吾乃饮河之鼠，各饱其腹而已矣。

其四曰《学忍堂文集》，是书荟萃先生论文，益精益博，创见纷呈。亦有以人生体验、治学心得指导后学之篇，其寄望也切切，其教诲也谆谆，感人肺腑，莫此为甚。

先生自1953年至南开大学任教，50年间兢兢业业，创树实多，择其要者有二：

其一，创建南开古籍整理研究所。是乃乘国家重视古籍之东风，得学校信任支持之委托，筹措部署，开基创业。招聘人员，不拘一格，更恪守规范。于时正气炽焉，淳风立焉。

其二，创建南开史学史博士点。八十年代，先生为南开大学创建了中国史学史博士点，是当时全国仅有四个同类博士点之一，南开于是拥有一项特色专业，此乃超越几多优势高校，大为南开历史学科增色。其他历史学博士点或由几名教授共同争取，而史学史则全赖先生一人的学术业绩与声望。……

其中《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之书，是杨先生筹划甚早、致力最多而在学界影响极大的著述。先生何时决计编纂此书，今已不能确知，但1957年于《南开大学学报》发表《三国两晋史学编年》一文，表明此前即已构想成熟，且实质性撰写工作已然开展。1987年，《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出版，起于先秦，至于隋唐五代；1994年第二册面世，内容范围包括北宋、南宋以及辽、金；第三册内容是元、明两代，交稿日期乃1996年底，而当时图书出版尚为旧式铅字排印，进程迟缓，校订艰难，经两年多的辗转，才于1999年出版。

《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二、三册陆续出版，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赞扬。公开发表的书评，刊载于《史学史研究》1987年第4期、《历史教学》1988年第1期、《史学史研究》1995年第2期、2002年第2期，论者认为本书具有“真、朴、精、博”的学术特点，考核精良，收录广泛，“在史学史研究中拥有不可替代的独到作用”；全书“具备勾画史学发展全景的学术宗旨……为深入进行史学史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线索与门径”，在学术上做出了无私的奉献。“这样一部著作，帮助我们掌握和了解我国史学发展的梗概，对于研究具体史家或史书也创造了条件，嘉惠后学，其功大矣”。

此外，对本书编纂义例加以细细品味，还有更当彰明之处：

第一，主体内容虽为相关史学资料的原文，但却是以著作家的史识和总括史学发展全局的眼光而致力于资料纂辑，体现出对于中国史学史知识体系的深入理解，采录的内容囊括史学史学科应当关涉的各个方面，尤其对于历代政权官方的史学活动、修史制度格外重视，同时也注意收载少数民族政权下的史学史资料。而中国古代史籍异常丰富，因此不可能一览全收、巨细毕载。隋唐五代之前尚可，而自宋代雕版印刷术广泛应用于史籍刻印之后，史籍数量大增，特别是明代史籍的印行极其纷繁，良莠不齐，很多杂史、笔记，对史学史发展

的影响微不足道，如果试图兼收并蓄、不遗锱铢，不仅不能实现预期，而且必然芜杂混乱、谬误丛生，尽失史学史学科的旨趣。总的看来，杨先生搜辑和选择资料，都经过审视、斟酌，顾及史学史发展的各个层面，但并非有取无舍、并非毫无重点。

第二，本书设计的编年方法，乃首举公元纪年，后列传统的帝王纪年。在政权分立时期，各政权属下在本年若有史学史资料见于选录者，即并立列该政权的纪年年号。这真是极为妥善的处置，其卓越之处，一是以公元纪年系统地展示中国史学的发展进程，时间标示浑然一体、亘古贯通，可便于查阅检索，可与国际学界接轨；二是照顾了沿袭甚久的传统纪年法，适于不同学者治史与考核的需要，但并不认同古人的正统论观念，而并立本年有史学事项的不同政权年号，清晰明了，方便学者运用资料。

第三，史籍编年体的困境之一，是难于安置年代不明的史事。本书在系年方法上多有机动性创造，例如将不明成书时间的史书，系于作者中进士之年、作者卒年、附于作者其他著述成书之年等等，这当然带有估测的约略性质，但毕竟使许多史籍资料的编辑可以操作，而多种方法的运用，亦具有力求接近实际的取向。实际上，大多史书的著成日期，只要编排在其作者的生活年代，就不会影响读者对史学发展面貌的确切认识，在这一点上不必胶柱鼓瑟，关键在于使重要史学资料得以显现。

第四，全书较多引录古代目录学著述的著录资料，此为特点，亦为优点。目录学著述曾被许多学术大家推为入学门径，以纪传体史书《艺文志》、《经籍志》为主体的非解题目录，能够提供史书传世源流的确实信息，有裨于文献考证，是史学史研究可资利用的重要环节，具有不可轻忽的史料价值。而《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四库全书总目》等解题目录，对所见典籍予以精练的评介，颇具知识性、参考性、启发性，是学术研究不可不关注的资料。解题目录与原书序跋相比，固然已非“原始”史料，但解题目录大多会传达史书序跋提供的撰述原委，且考论、评析往往比序文跋语更加公允，因为序跋、特别是明代史书的序跋，夸饰、吹捧已为普遍现象，如果缺少解题目录的评论资料，会给初学者带来一定的误导。

但是，杨先生编纂这部著述的年代，各项条件都不能与现今相比拟，首先是稀见史籍和善本史书，分散于全国各地，加之保护性、垄断性管理控制，欲得一观，难乎其难！势必造成资料收集和考订的某些缺环，无法求全责备。近

年来大型丛书如《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的出版，更有电子版图书、网络图书的出现，情况大为改观，这是当年学术界所意想不到的发展。其次，当年图书无论编纂还是排版，基本属于手工操作，先是本人或委托他人从书籍中抄录资料，经过删定，再予以誊清。交于出版社后，根据稿本排列铅字，印出清样后反复校订。环节既多，且易造成文字讹误，校订费力费时，疏漏之处难免。因此，在整体文化条件大为改善的情况下，本书前三册实有适度增订之必要。

此次增订工作，总括而言，主要在三个方面力求改善：一是校改原书的讹误文字；二是增补一些必要的史学事项；三是调整和修改一些资料的系年，而使之更加准确。但增订工作不等于重新编纂，应当尽量保持杨先生原书的主体面貌，即不过多地揽入新的、不见得十分重要的史学资料，以免喧宾夺主。由于三册原书的具体情况不同，除皆应致力于文字校勘之外，各册增补、考订亦有因事制宜的偏重，谨择要说明如下：

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一册，起始于公元前 841 年即“共和行政”之年，这是中国具有确切年代可考的开始，此种处理无疑是十分严谨的。然而探讨中国史学的起源，应当向更久远的社会背景进行追索，本册增订的结果，决定从周武王伐纣建立西周朝代起始，因为西周之初的“殷鉴”观念，是中国史学起源的最关键促进因素。虽然西周纪年至今还未能定论，但追溯史学起源状况对于史学史学科而言，尤其重要，不能坐待准确西周纪年的获得。由于上限的提前，导致新增若干史学事项，如《尚书》某些篇目的出现、《逸周书·史记解》的撰写等等。与此同时，依据最新的研究成果，修改了《战国策》、《世本》的成书年代，将之移于第二册。另外，原书第一册没有干支纪年，今经过斟酌，决定自东汉起附入干支纪年法。以上都是增订后较大的变动，其余修订，这里不一一列举。

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二册（宋辽金卷）编纂精湛，此次增订主要是补充了一些重要的史学事项，包括官方的史学举措。例如欧阳修的《正统论》、宋哲宗时期禁毁范祖禹《唐鉴》、李焘撰《六朝通鉴博议》、南宋末年史官高斯得修史奏议等等，不一一列举。其中有国内佚失而尚存于日本的两种史籍，即诸葛深著《历代帝王绍运图》与杨次山撰《历代故事》，也补充编入。个别史书的系年也有所调整，例如将《蒙古秘史》改系于公元 1252 年，并且补充了较多资料。

原《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包括元代、明代的内容，明代史籍尤其丛脞繁杂，《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等大型丛书出版之后，许多此前难以寻觅的史书，转而便于阅览，从而加重了本册的增订任务，取舍之间，不易斟酌。此次增补考订，用力远过于前二册，主要修订工作有以下几点：

1. 补充许多史学事项，其中以史书为主体，亦有史学议论、史学事件内容。例如宋遗民周密的《武林旧事》、《齐东野语》，苏天爵《论修功臣列传疏》，廖道南《殿阁词林记》，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姚允明《史书》，王士骥《皇明御倭录》，郭大有《评史心见》，刘元卿《诸儒学案》等等，不能一一列出。连同其他资料的补充，比原本增加了10万字左右。但添补史书也不得漫无涯涘，因为《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绝不是史籍目录之书，其旨趣在于中国史学史的发展历程，过多收载驳杂史籍，于明晰史学发展的大体并无裨益。而甄择去取之间，见仁见智，难免有所失宜，唯祈博雅君子指正与鉴谅。

2. 对原来已经收载之史书，亦择要增补序跋等类资料，同时根据新见资料，对许多史书的系年做出调整和改动，有些改动的时间跨度较大，如王洙《宋史质》、徐学聚《国朝典汇》、程敏政《宋遗民录》等等。改动系年者数量颇多，不必毛举，而这样增订后，不免与原书之资料详略、前后顺序有了较大的区别，但原则上是对原书增而不减，出于对原作的尊重，极少采取删去原有资料的做法。本册有些资料的增补，乃来自日本所藏珍稀版本，例如张居正的编纂《帝鉴图说》，此次补入日本国会图书馆藏明代刻本中王希烈《帝鉴图说后序》，有助于考证其书的流布；对于魏显国《历代史书大全》，则增补了日本内阁文库所藏全本中的郭子章、许孚远两篇序言，以及该作者《史书总论》等资料。

3. 此次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元明卷），择要补入了几种日本现存中国稀佚的古代史籍，如明宣宗《御制外戚事鉴》、顾充《皇明一统纪要》、史继偕《皇明兵制考》、张一龙《武库纂略》、林兆鼎《威暨录》等等，这些史籍多数在海外也已成为孤本，而且内容相当重要，予以增补编入，很有必要。

4. 清朝入关前已经具有不少史学性质的活动，原第三册没有涉及，今予以增补，谨按公元年限编入，同时在该年份标示清太祖或清太宗的纪年，与明朝的帝王纪年并立。

此次编纂所成的清代卷，断续拖延，历年弥久。早在2001年中，业师即委令由我全部负责编辑，囑言可以邀请一位合作者。我当即说出所欲邀请之人，

并且表明仍须先生主持并且署名。而业师正色指示：此书并非一年、二年即可撰成，自身既然不能审稿、定稿，就不署名，这不是谦让，实际是不愿意为你编纂之书担当责任和名声。届时成书的质量优劣，应当由你负责，无可推卸。这使我感到莫大的压力，颇生畏惧。随后，杨先生本年在给仓修良先生的信中申明：“拙编《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已出版三册，至元、明为止，本拟续出第四册（清朝），但因眼力不济，难以完成，现已托我的学生乔治忠及古籍所的另一同志代为编写，写成后署他们的名字，就与我无关了。”

后来，我所邀请、得到杨先生首肯的合作者退出了此事，我个人也忙于其他研究项目，仅分配自己的研究生间断地抄录一些《四库全书总目》中清代史书的提要等等资料。其中侯德仁君于我名下连续研读硕士、博士学业，且立志研究清代史学，所手抄资料较多，花费不少时间。而时代前进，科技发展，学术改观，《四库全书》检索电子版以及其他电子图书日益扩展和普及，使原来手抄的《四库提要》一类资料基本失去利用价值，因为复制、粘贴然后再细致校订的方法，既快捷又可靠，“资料编年”这类书籍的编纂，面临了方式方法的重大转型，许多准备工作虽已耗力不少却归于无用。

至2002年，业师对已经出版的三册《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表达了某些遗憾，只是并没有对我提出予以校正、增补的期许。业师逝世后，我逐渐感觉：似应将编纂第四册与修订前三册结合起来，同时完成和出版，但毕竟未得先师的明确嘱托，处于犹豫、动摇之中。经多次与同门学友谈论，未逢异议，后又得到先生之哲嗣培林君认可，才决定照此办理。于是，连续几届本专业的研究生，大部分多多少少参与了前三册文字录入和校订的工作，参加者及其工作量已经无法确计。其中值得提到的是：已经在扬州大学任教的王嘉川君，也策动和指挥学生参与了此事。增订工作于今日得以完成，可谓为“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结果。而与我全面通力合作且贡献甚大者，乃朱洪斌君。朱君学术扎实，知识渊博，读书极广，专精于史事和文献的考证，有超常之解决难点的能力。在合作过程中，尝使我有“今得朱君，盖为天赐”之叹。

追忆本书增订与编纂历程，多少甘苦，未经历者无从感触，而经历者虽有感触却无法言表。此书迁延多年迟迟未成，是其貌似容易、做起来却时时捉襟见肘、难以措置。更思业师以一人之力，在条件远不如今的当年，竟撰成洋洋三册！因油然而生感愧之情。今所纂成第四册清代卷，努力承袭先师拟定的编撰理路，或许精思、深考未能圆满，但毕竟补上此册，可使整部撰述首尾完具，

似聊可弥补十年间因循、拖沓过失之万一，故述“感言”有如上文，且寄意诗作于下款：

《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书成寄意（七律）

“编年”三册作丝纶，
义例精微立本真。
辽阔学途须达理，
苍茫史海可知津。
时移世转仍遵嘱，
业继薪传敢续麟。
借问书成何企盼？
后来才彦更莘莘！

2013年4月30日

例 言

一、本书系《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之元明卷。《增订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将历代重要之史学史资料按年编列，以系统地展示中国史学史发展脉络，备学习和研究中国史学史之参考。

二、所标年代首列公元纪年年数，次列各朝帝王年号及年数，后列干支。因所引资料均为旧历年月，故以旧历为准。但旧历与公元存有岁差，为免将旧历一年之事分列两年、或在公元一年中并列两种旧历纪年，故旧历整年史事仍按一般史表通例，编列于旧历岁首之公元年内。

三、政权分立时期的年号，酌以引录资料所涉及者标示，如清入关前政权的史学事迹，于相关之年列出清太祖或清太宗年号。

四、本书引录之资料，力求以原始资料与最早记载为主，包涵史家、史籍及史事等史学史内容。所录资料，首明出处，涉及稀见文献及其版本，于案语中说明。近人之论述，除有关年代、事迹及著述内容之考订者外，均不具录。

五、历史地理、方志类著作，仅酌取记述全国范围以及对史学发展影响较大者，一般地方志撰述，概不具录。

六、史家之生平事迹，只录其主要经历及有关史学之活动，其他如政治、军事、经济、文学、哲学等方面之事迹，一般从略。

七、重要史家之生卒年代均可考知者，除对于史学有重大影响者外，一般只列卒年，不列生年。清季重要史家如卒于民国时期者，仅列生年。

八、所列史籍、史事资料之年代，如引录资料无明文记载，则加案语考订，或说明编于某年之理由。若不能确实考订其年代，则附编于某朝灭亡之年，或列入有联系的史事之后。若知该书作者之卒年，则编于卒年之下。对于重要史书，编年首取成书年代，成书年代不明者，再系于相关事件之年。不甚重要史书，可一并系于作者卒年，或编于其他相关事件之年。

九、本书首标年代，次以标题概括所录资料之内容，以下引录原文若干条。原文中有自注或他注者，加括号以小五号宋体字表示。编者另酌加案语，对引录资料商榷异同、考订旧说或补充文献、提示要旨。于是纪年、标题、资料、案语，四者分列，以求眉目清晰，便于读者参考。

十、本书引录资料原文，但引文之内往往原作者亦有引文，为避免引号的使用层层套叠，故省略整段资料之总的引号，但仍保证文字上忠于原作。

十一、增订资料来自《四部丛刊》、《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四库全书禁毁丛书》、《续修四库全书》等近年通行的大型丛书者，为节省篇幅而一般不注明版本。

十二、杨翼骧先生原有案语，尽量保留，仍题为“案”；今所订补者，题为“今案”。案语谨以考订史学事实为中心，一般不作无关史实考订的分析评论。所辑补新增资料，一般不另作标示。案语格式分两种情况：随资料文句之后注出者，加括号并且以小五号楷体字表示；在引录资料后另起一行者，首字缩四格以五号楷体字表示。

公元 1280 年 元世祖至元十七年 庚辰

王应麟著成《通鉴地理通释》。

《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王应麟，字伯厚，庆元府人。九岁通《六经》，淳祐元年举进士，从王埜受学。调西安主簿。……差监平江百万东仓。调浙西提举常平茶盐主管帐司。……调扬州教授。初，应麟登第，言曰：“今之事举子业者，沽名誉，得则一切委弃，制度典故漫不省，非国家所望于通儒。”于是闭门发愤，誓以博学宏辞科自见，假馆阁书读之。宝祐四年中是科。……添差浙西安抚司干办公事。……迁主管三省、枢密院架阁文字。迁国子录，进武学博士。……召为太常博士，擢秘书郎。……迁著作佐郎。度宗即位，摄礼部郎官，草百官表。……授兼礼部郎官、兼直学士院。……迁著作郎，守军器少监。……迁将作监。……擢兼侍立修注官，升权直学士院，迁秘书少监兼侍讲。……迁起居舍人，兼权中书舍人。……以秘阁修撰主管崇禧观。久之，起知徽州。……召为秘书监，权中书舍人，力辞，不许。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兼侍讲。迁起居郎兼权吏部侍郎。……授中书舍人兼直学士院。……进兼同修国史、实录院同修撰兼侍读，迁礼部侍郎兼中书舍人。……寻转尚书兼给事中。……所著有……《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

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自序》：太极肇分，天先成而地后定。天依形，地附气。地囿于天者也，而言地理者，难于言天，何为其难也？日月星辰之度，终古而不易。郡国山川之名，屡变而无穷。是故图以经之，书以纬之，仰观俯察，其用一也。

《虞书·九共》，先儒以为《九丘》，其篇轶焉。传于今者，《禹贡》、《职方》而止耳。若《山海经》、《周书·王会》、《尔雅》之《释地》、《管氏》之《地员》、《吕览》之《有始》、《鸿烈》之《地形》，亦好古爱奇者所不废。然诸儒之传注异，历代之区宇殊。禹之九河，班《志》仅得其三。商之八迁，孔《疏》未闻其四。汉水东西之分，积石大小之辨，荆山之于荆、豫，梁岐之于冀、雍，潜在荆者未见，蔡在圻内者未详，三江、九江、五邦、三亳，则《书》之说异焉。还之为营，祢之为泥，以著为齐地，以韩城为涿郡，自土之为自杜，倭迟之为郁夷，邹虞之为梁邹，二南之为南郡、南阳，则《诗》之说异焉。扬纡在冀，而《尔雅》以为秦。卢水在济北，而康成读为雷。漳水之为潞，吴山之为岳，五湖混于具区，潁湛列于荆浸。此《职方》之疑也。豫章在江南，而江北之地未知。中牟在河

南，而河北之地难考。许田，鲁地而非近许。鄢，郑邑而非鄢陵。谷、小谷之有别，父城、城父之不同。此《春秋》之疑也。二地而一名者，若王城、葵丘、酒泉、贝丘、钟离之类。一地而二名者，若白羽、夹谷、夷、垂葭、发阳之类。方城、细柳、丹水之有三，涂山、历山、东阳、武城之有四。“瞻彼洛矣”，与东都之洛异；“导洛自熊耳”，与宜阳之熊耳殊。首阳、空桐、新城、石门、石城、丹阳、白沙、硖石之属，其地非一。毕万之魏，为河中之永乐，而以元城为大名，失矣。自庐振廩，为襄阳之中庐，而以合肥为庐国，失矣。潘岳赋《西征》，不知成师之曲沃在河东；韩皋论《广陵散》，不知魏之扬州治寿春。韩文公，南阳人，在河内之修武而误曰邓州；《史记》郾关，在汉中之长利，而误曰洵阳；杜子美诗三奇戍，在彭州之导江，而误改曰三城。荀卿兰陵，非常州也；孔明渡泸，非泸州也；公琰屯涪，非涪州也；公瑾赤壁，非黄也；元规南楼，非鄂也。郢都白雪，误于郢州；东海二疏，误于海州。以涂山为会稽，以啮桑为采桑，以大别为安丰，以东陵为庐江，以楚丘为成武，以街亭为南郑。袭讹踵缪，不可殫纪。汉、沔一也，而或二之；吴、会二也，而或一之。江统误鄠于沛郡，皇甫谧误商丘于濮阳，颜师古误邛都于邛州、青衣于嘉州、南陵于宣州。注《文选》不知夷庚，注《本草》不知沙苑，博见强志者犹或失之。旧迹湮没，如济绝于茱，碣石沦于海，昆明凿而镐京为池，隋城立而汉都为苑。南北侨置，如青有太原，豫有广陵，六合之为秦郡，项城之为秣陵，玉门之为会稽，浔阳在蕲而移柴桑，当涂在濠而寓姑孰。郡名非古，如云之云中，平之北平，蓟之渔阳。县名非古，如京兆之武功，丰州之九原，皆非秦汉之旧。或若异而同，或似是而非，不可谓博识为玩物而不之考也。

余闲居观《通鉴》，将笺释其地名，举纲提要，首以州域，次以都邑，推表山川，参以乐毅、王朴之崇论宏议，稽《左氏》、《国语》、《史记》、《战国策》、《通典》所叙历代形势，以为兴替成败之鉴。大《易》设险守国，《春秋》书下阳、彭城、虎牢之义也。河湟复而唐衰，燕代割而辽炽，述其事终焉。若昔对白题、羊肠、帝丘、内黄、问松亭、柳河者，以该洽见称，今岂无其人乎？孤陋寡闻，未免阙误，以俟博雅君子。山河不改，陵谷屡迁，亦以发鉴古之一慨云。上章执徐岁橘壮之月，子王子书《通释》后。

钱大昕《王伯厚年谱》（《深宁先生年谱》）：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庚辰，五十八岁。八月，《通鉴地理通释》成。

《宋史》卷二〇三，《艺文志二》职官类：王应麟……《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七，史部编年类：《通鉴地理通释》十四卷，宋王应麟撰。……是书以《通鉴》所载地名，异同、沿革最为纠纷，而险要扼塞所在，其措置得失亦足为有国者成败之鉴。因各为条例，厘定成编。首《历代州域》，次《历代都邑》，次《十道山川》，次《历代形势》，而终以《唐河湟十一州》、《石晋十六州》、《燕云十六州》。书本十四卷，《宋史》本传作十六卷，疑传刻之讹也。其中徵引浩博，考核明确，而叙列朝分据战攻，尤一一得其要领，于史学最为有功。原书无序，后人以书后应麟自跋移冠于前。所云上章执徐橘壮之月，乃元世祖至元十六年（今案：误，应为十七年）庚辰八月，是时宋亡已三年，盖用陶潜但书甲子之义。书内称梓慎为梓谨，亦犹为宋讳云。

《古今纪要》等作者黄震卒。

《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震常告人曰：“非圣人之书不可观，无益之诗文不作可也。”……所著《日抄》一百卷。卒，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

《宋元学案》卷八六，《东发学案·文洁黄于越先生震》：黄震，字东发，慈溪人，学者称为于越先生。……宋亡，饿于宝幢而卒，门人私谥曰文洁先生。先生本贯定海，其后徙于慈溪。晚年，自官归，复居定海灵绪乡之泽山，榜其门曰“泽山行馆”，其室曰“归来之庐”。……已而迁寓桓溪，自署“杖锡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

《宋元科举三录·宝祐四年登科录》：第四甲第一百五人黄震：字东发，年四十四，五月十四日辰时生。……本贯庆元府慈溪县，自为户。

陈垣《黄东发之卒年》（见《辅仁学志》第十二卷一、二期，1943年12月）：黄东发之生年，据宝祐四年登科录年四十四，则应生于嘉定六年癸酉。其卒年则各家疑年录均未之及也。陈著《本堂集》九十有挽黄提举震及挽黄祖勉梦榦各三首。祖勉，东发子，本堂与东发为同年进士，与祖勉为亲家，其次女，祖勉冢妇也。其挽东发诗注云：“戊寅十月访于山居。”又云先生六十七岁，作《醉吟先生传》，则祥兴二年己卯，东发犹健在也。其挽祖勉诗云：“谁料生刍奠，今年又乃翁。”又云：“九京不可作，乔梓北风悲。”则东发父子同一年卒也。其挽祖勉诗注云：“到山北葺精舍，未竟得病，返寓所宝幢见亲，未见而歿。”则祖勉先卒于东发也。然两诗均不著撰年，惟挽祖勉诗有“辰龙竟归梦”之句，辰龙似指元至元十七年庚辰，则东发卒年当六十有八。《本堂集》三十七有《赠吴安仲序》。安仲，东发婿，序亦不著撰年，而有“余交国史黄公为深，公死